

中國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

林佩蓉

一、前言

2023年發生了幾件令台灣文壇擔憂的事，包括八旗文化出版社的負責人富察以及網路作家羅森，受中國政府以各種法制拘禁，為兩方的文學交流與互訪，蒙上更深的陰影。這些在許多政治分析中，都與台海局勢、中國對台灣的威脅緊密相關。然而在「華文」系統下，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觀察與關注、想像持續存在，包括學術研究與出版、媒體報導與評論、教育領域的推廣等。

整體觀察而言，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評論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反映了兩地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場和歷史脈絡。以下是分析中國對台灣文學評論的幾個方面，而這些議題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統一的話語框架：中國的官方文學評論往往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文化，並在評論中突出「民族認同」的主題。政治敏感性：對涉及台灣主權、民族身分探索或與中國對立的文學作品，中國評論界多持批評或忽視態度，有時甚至完全避免提及。文學成就的選擇，對台灣現代文學的重視：中國文學界對台灣現代文學的表現形式與內容集中在某些作家，例如白先勇、余光中，少有明鄭時期以降的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今年度僅有廣西師範大學劉云思華的博論〈楊廷理文學研究〉，描術楊廷理的移動足跡，探討其作品

中反映台灣噶瑪蘭由荒埔到設廳的開發建置歷史過程，並提出楊廷理的遊宦詩歌風格對官員、文人以及台灣本地文人的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同時，其在台灣力主興辦書院，編修地方志，促進了台灣教育文化發展。

另有跨文化對話的關注，部分評論著眼於台灣文學如何吸收外來文化，特別以日本文學為主，並導入中國文學傳統，企圖展現多元化的文學特點。關於台灣文學史的研究方面，包括去殖民化與鄉土文學運動，中國學者關注台灣文學如何從日本殖民時期脫離，發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學運動，例如相關於鄉土文學，他們通常將這些運動解讀為反映社會現實與人民生活的「民族自覺」表現或是大眾／素人之眼的觀察。對當代台灣文學的態度，隨著全球化影響，中國評論界對台灣後現代文學的多樣性與創新性（如新女性文學、酷兒文學、馬華文學）有一定興趣，但仍會避免對挑戰傳統價值的作品進行深入分析。

市場現況的影響：隨著台灣文學在中國市場的流通（如小說出版、影視劇改編、歌詞等），中國讀者對台灣作家的接受程度看似提高，仍在政府監督之下，帶著紅色評論看待台灣文學的內容。短文加上短影音的傳播，成為時下大眾在頻繁移動、急促接受新知時，最符合需求的媒體型態，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披露，小紅書自2013年成立

以來，今年度淨利潤達5億美元，相當於新台幣160億，足見資本的雄厚以及傳播的威力。

今年度獲得研究者關注的依然是以下幾位作家：白先勇，以《台北人》等作品聞名，描繪了台灣社會的多元面貌。龍應台，其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兩岸引起廣泛討論，探討歷史與人性的深度。朱天文，與導演侯孝賢合作，作品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展現台灣的社會變遷。駱以軍，以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和深刻的心理描寫，作品如《西夏旅館》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張大春，其作品融合傳統與現代元素，如《城邦暴力團》等。這些作家的作品在中國的學術研究、翻譯出版和文學討論中，均引起廣泛的討論。

以下透過專書、博士論文、期刊等資料，以「馬華文學的研究」、「期刊發表的幾點觀察」兩方面進行評析。

二、馬華文學的研究

2023年，中國學術界對馬華文學，特別是張貴興和李永平、黃錦樹，有以下的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方面，8月於山東大學舉辦的「中國小說論壇」，學者黃萬華發表〈從「南方之南方」出發：馬華當代小說的經典性管窺，兼及「新南方寫作」〉，深入探討李永平、張貴興等馬華作家的作品，為在場者開啟對「新南方寫作」的思考。謝魏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發表〈暴力、鬼魅與翻轉的「南洋圖像」——論黃錦樹小說集《烏暗暝》的歷史書寫〉，則以小說集《烏暗暝》中，通過雜糅現實與虛幻、「個體史」與族群史的多重敘事作為研究，他提到黃錦樹以奇譎的想像構造充滿內在生命力的

文學空間，這既是對歷史敘述之暴力面向的抵制，也是挖掘歷史的潛在「復魅」的重要嘗試。作者認為《烏暗暝》呈現出對「中國性」、國族敘事、左翼小說、文化記憶等話題的深入思考。此篇論文是少見未有政令文法的評論方式，他認為黃錦樹的這些思考為重新探詢內嵌於文本的歷史，關於記憶之張力結構的深層運作，以及塑造作家的自我認知、反思國族敘事，為審視當代馬華文學中審美與政治範疇間的複雜張力提供新的思考起點。同時，黃錦樹對馬華文學史，尤其是自身所處「無國籍文學」位置的獨特理解框架，為「後理論」時代的世界文學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小文學」個案。惟所提到的「中國性」，恐怕也忽略了《烏暗暝》中〈大卷宗〉等篇章所欲觸及的大馬華人認同問題，時至今日，華人自中國移居到馬來西亞，已經經歷好幾世紀、上百年與當地族群的接觸，似已無法放在大中華文化傳統的框架來解釋。¹

專著出版方面，有中山大學教授朱崇科於12月出版《台灣經驗與「南洋」敘述》，該書深入探討新馬華文文學與台灣經驗的關聯，集中討論李永平、張貴興等作家的作品，對馬華文學的研究提供切入視角。另外，因應張貴興的長篇小說《野豬渡河》獲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馬華作家，這也引發了中國學術界對其作品的廣泛關注。其最新作品《鱷眼晨曦》被《亞洲週刊》評為2023年度全球華人十大小說之首，進一步提升了其在文學界的影響

1 由於涉及台灣與中國外的族群論題，可參考詹閱旭，〈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台灣—馬華文學〉，《台大文史學報》78期（2013.05），頁45-74。

力。這些活動和成果顯示，今年度中國學術界對馬華文學，特別是張貴興和李永平的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也開啟台灣與中國對於馬華文學的差異性討論。

三、期刊發表的幾點觀察

（一）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

幾種穩定發刊的期刊包括《廈門大學學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台灣研究集刊》、《華文文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福建論壇》等。議題圍繞在1970-1980年代的台灣作家，包括余光中、白先勇、駱以軍、王鼎鈞等人。長期研究台灣文學的朱雙一產量漸漸減少，今年發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方觀點」——陳映真、呂正惠等的觀察、思考和批判〉，他提出當今華文學界對於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文壇歷來存在著正、反兩面的觀點，各自又可分為「當時言說」和「歷史回顧」兩類。他認為早期倡導者，將現代主義等同於「現代化」；陳映真則認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階段社會問題的反映，是「無罪」的，但缺乏對「人」的關懷和希望的鼓舞，朱雙一的看法與台灣評論者有很大的差異。他認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發生於農業社會，缺乏產生的必然社會經濟條件而有「早熟」之嫌，表現出耽溺於移植、模仿的亞流性格，以及思考、知性上的貧弱癥狀。這一點便忽略了1930年代台灣藉由日文的翻譯引介，吸收了歐美的現代主義思潮，同時台灣的社會已是工業化，並非只有農村樣態。朱氏對台灣在日治時期文學的發展，因為資料訊息的不完整，始終停留在「大中國思想」的敘述下。

論及日治時期的研究，林娟芬〈近十年日本學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批判性考察〉收錄於《福建江夏學院學報》，提及隨著日本學者的世代更替和社會思潮的變化，近十年日本學界針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發生較大變化，產生很多新的學術增長點，如繼續深耕新史料的開掘和整理；在台灣生活過的部分日本學者也開始介入日治時期台灣重寫文學史運動；第一部由日本學者合著的台灣文學通史面世；運用「外地日本語文學」框架闡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日語寫作；開啟日治末期台灣文壇中國古典的翻譯、殖民地的雜誌研究、兒童文學研究。林娟芬提及「遺憾的是日本學界的很多研究依然難以跳出帝國視角的藩籬，有意遮蔽隔斷歷史」，這也再次對應了中國學者對於日治時期，存在於日本、台灣與中國的糾葛與史觀，既言之應該「脫帝國」，自身卻也在中國帝國的框架上論述台灣，這樣的課題自然也就成為各自表述的結果。

在《台灣研究集刊》中，有郭俊超〈張我軍與武者小路實篤的文學相遇——從一篇佚文談起〉、陳忠純、李婷〈《台灣日日新報》的中國大陸報道——以張學良相關報道為中心（1924-1933）〉、高維宏〈矢內原忠雄的殖民經濟論及台灣知識分子的接受與批判〉、黃俊凌、阮倩晴、王天陽〈「皇民化」運動下台灣知識分子的迷惘與中華文化堅守——以《吳新榮日記》為中心的討論〉、歐陽月姣〈「教育漢文體」的發生與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據台灣早期日語教育中的言／文關係考察〉以及台灣學者崔末順〈「總動員」體制下日據台灣的大眾娛樂

論述——兼與朝鮮半島比較》。《台灣研究集刊》為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刊行，研究台灣文學歷史悠長，時至今日該校依然是觀察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學的前哨站，以該校的台灣研究所出版的期刊，即相當具有中國觀看台灣文學的代表性，今年度的發表文論可見其關注當下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有必要梳理1895-1945年的日治下的台灣文學發展。近幾年的觀察亦是如此，即使該所的文學研究室，包括研究台灣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文藝思潮以及民間文學、影視藝術等，以往較多集中在1945年戰後現當代文學，2023年特別以日治史料作家為主，可推論與其時局觀察有關。

只是這些論題最終導向都是一致的論述，包括馬泰祥〈語言、文學與認同：論台灣新文學的「跨語實踐」〉（《廈門大學學報》），陳忠純、洪思音〈「國家統一的必經之途」——20世紀20年代《台灣民報》對「民族自決」論的思考新探〉（《福建論壇》），提到20世紀1920年代前後，台灣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民族自決」論的啟發下，對台灣抗日民族運動及其與祖國革命運動的關係有新的認識。《台灣民報》是當時台灣知識群體最重要的言論機關，在這一思想歷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一開始，《台灣民報》吸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強調「自治主義」，以期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實現。不過，隨著美國「排日法案」的通過，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扭轉了台灣知識分子對於「民族自決」論的理解，後者拋棄了對日本的幻想，轉而將「亞細亞聯盟」與「民族自決」聯繫在一起，為祖國的反帝鬥爭搖旗吶喊。隨著國民革命的興起，孫中

山及中國國民黨將「台灣革命」納入「國民革命」範疇，明確了台灣解放是中華民族完全解放的必然要求。祖國的呼喚喚醒了台灣知識分子內心根底的「中國民族」認同，他們提出與祖國一道致力於反帝鬥爭，融兩岸革命為一體，最終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這樣的書寫，形成讀眾篇即如讀一篇的荒謬感，未能梳理細節，又預設一個帽子四處安放，降低了參考的價值。

（二）其他議題

其他議題中包括對於台灣百年話劇、劉大任的創作、洛夫在《力報》報中的散文作品，以及余光中、琦君、林海音、王鼎鈞、聶華苓等的作品風格，以《華文文學》期刊為主。在議題上則有「鄉土文學」的討論，賴清波〈以生態作為方法：台灣鄉土文學中的環境意識和人地關係〉，談1960年代以降，被歸類為台灣鄉土作家的黃春明、陳映真、洪醒夫、王拓等的作品對人與土地／自然關係的思考，對於勞動階級（漁民、農民、勞工）為解決生計問題與大自然的爭奪，透過鄉間小人物的悲歡喜樂表達了鄉村在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衝擊下的環境傾頹、今昔的環境變遷，乃至人與動物／自然命運共同體的情感。作者提及如果把鄉土文學放在環境運動的脈絡來看，這種對人地關係的思考為自然生態文學／生態批評論述提供了另類的思想資源，是一種從土地和社會生發出來的素人思考。

期刊論文的研究主題，已可說是最接近當年度及時代對文學發展的觀察，這幾種對台灣文學研究關注的期刊，都有相當長的歷史，也在當地資源相當充足的學術機構中穩定的經營著，相較於上一年度，所拓展的作

家較為多元，議題上則仍視台灣政治而關聯發展著。

四、小結

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評論是文學、文化與政治交織的產物，帶有一定的雙重性。一方面，中國文學界對台灣文學的藝術成就、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都持續保持關注；另一方面，評論的意識形態框架限制了其討論的深度與廣度。這些也都取決於中國對外資訊的掌握，而台灣如何看待這些資訊，特別在資訊作戰、許多假訊息傳播的現況下，台灣不得不設法穩定、擴張「華文」系統的話語權，並透過外譯，主動打入亞洲其他國家、歐美等非華語系又具「漢學」研究的範疇，如此才能向世界釐清、持續證明，台灣文學的「華文樣貌」。